

云南藏书文化研究

王水乔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藏书文化研究

王水乔 著

 云南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藏书文化研究 / 王水乔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2-14197-1

I. ①云… II. ①王… III. ①藏书-文化史-研究-云南省 IV. ①G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2291号

出品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项万和 庞远燕 范可

装帧设计: 昆明昊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肖薇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云南藏书文化研究

王水乔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0

字数 300千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康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4197-1

定价 42.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云南藏书文化研究动态 / 1

第二节 开展云南藏书文化研究的意义 / 6

第二章 宗教藏书文化研究 / 11

第一节 佛教藏书 / 12

第二节 原始宗教典籍的收藏 / 71

第三节 道教典籍的收藏 / 98

第四节 伊斯兰教典籍的收藏 / 101

第三章 书院藏书文化研究 / 102

第一节 昆明三大书院藏书 / 104

第二节 其他书院藏书 / 112

第三节 陈灿与云南书院藏书 / 116

第四章 私家藏书文化研究 / 118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藏书家 / 119

第二节 清末至民国年间的私人藏书家群体 / 130

第三节 私人藏书家群体对文献的整理 / 180

第五章 官府藏书 / 192

第六章 图书的刊刻 / 196

第一节 官 刻 / 196

第二节 坊 刻 / 200

第三节 私家刻本 / 201

第七章 云南藏书的散佚 / 206

第一节 藏书毁于兵燹 / 207

第二节 藏书毁于编纂《四库全书》时的收缴 / 209

第三节 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损毁 / 223

第四节 云南佚著考 / 225

第八章 云南藏书纪事诗 / 245

第九章 云南公共图书馆及其他各类图书馆的藏书 / 266

第一节 云南图书馆对文献的征集、刊印和编辑 / 266

第二节 《云南丛书》的编纂 / 282

第三节 其他各类图书馆的藏书 / 300

参考文献 / 309

后 记 / 312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云南藏书文化研究动态

藏书是指以图书的收藏为核心,包括图书的保护、整理、流传、散佚在内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在历史中国,特指皇家、私家、寺观、书院等的典籍图书的收藏,其概念往往不仅仅指藏书,而且还包括与之有关的购置、鉴别、校勘、装治、典藏、钞补、传录、刊布、题跋、用印、保护等一系列活动。”^①而经1995年“中国当代藏书活动研讨会”与会专家的研讨,对藏书的概念初步形成共识,认为“藏书是指人类为阅读、保存、鉴赏、研究和利用为目的而进行的收集、典藏图书的活动”^②。傅璇琮、谢灼华先生也认为,藏书是人类为了阅读、鉴赏、校勘、研究和利用的目的,而进行的收集、典藏、整理图书的活动。^③

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整体由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个系统组成^④,而藏书活动本身就具有文化性,包括:

① 王余光、徐雁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424页。

② 同上书。

③ 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导言》,宁波出版社,2001,第2页。

④ 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第3页。

藏书活动的主体——各种藏书机构和众多藏书家；藏书活动的客体——典册、图书本身；藏书活动，诸如图书的收集、购求、鉴别、保藏、研究、散佚等；与藏书活动关系密切的刻书、书肆等社会风尚，以及藏书风尚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等。^①正如来新夏先生所言，“中国的藏书活动中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贯穿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仁人爱物’。所谓‘仁人’，即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结起来，使所藏图书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②1997年，来新夏在《中国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藏书文化伴随着图书的产生而出现，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它以逐渐丰富的藏书、日益完善的藏书机构、专门的收藏家和研究者、建设各种与藏书有关的专学，并以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为主要支柱，润泽着全民族，形成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结构之一。因此，研究中国的藏书文化，特别是对中国藏书文化基本理论的探讨，尤有必要。”^③如古代私家藏书是一种内蕴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看，它既有汗牛充栋的图书、巍然矗立的藏书楼等物态文化，又有在长期藏书活动中形成的措置之术和风尚、习俗等行为文化，还有在藏书家主体因素潜层的心态文化。如此丰厚的内容，决定了古代私家藏书必然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④

对于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自叶昌炽在19世纪后期撰写《藏书纪事诗》以来，先后出现过两次研究热潮。首次研究热潮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⑤，发表的有关中国历史藏书的文章在四五十篇。著作有杨立诚与金步瀛合编的《中国藏书家考略》、陈

① 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现代出版社，1999，第5页。

② 来新夏：《中国的藏书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书与人》1997年第4期。

③ 来新夏：《中国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书城》1997年第5期。

④ 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页。

⑤ 徐雁：《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藏书研讨成果综述》，载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第402页。

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等。^①

第二次藏书研讨高潮的发端，以中华书局于1982年公开出版《古代藏书史话》和《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两书作为标志。《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学研究》《文献》《图书馆杂志》等专业期刊，先后发表了黄裳、骆兆平、谢灼华、黄建国、范凤书等学者的有关论文。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形成新的学术研讨高潮。据1997年底的不完全统计，这10余年内正式发表的论文达到1000篇以上。^②断代的和区域的藏书家研究受到关注。林申清《明清藏书家印鉴》，1990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1998年由北京现代出版社出版；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1983年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王绍曾、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199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1987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薛愈编著《山西藏书家传略》，1996年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③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学术界先后有三部藏书家传记辞典和多部综论、历代藏书的学术著作公开出版，分别是李玉安、陈传艺编《中国藏书家辞典》，1989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河主编《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1991年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梁战、郭群编著《历代藏书家辞典》，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郑伟章、李万健合著《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1986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焦树安编著《中国藏书史话》，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徐雁著《沧桑书城》，1999年由岳麓书社出版。^④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以“中国藏书”为主题召开的综合性研讨会就举办了三次，依次是：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当代藏书活动研讨会”，1996年12月在宁波召开的

① 徐雁：《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藏书研讨成果综述》，载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第403页。

② 同上书，第404页。

③ 同上书，第412～414页。

④ 同上书，第416～419页。

“天一阁与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1997年12月在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①。

受全国学术界藏书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云南省图书馆界和学术界也结合本省史料开展了对地方藏书史和藏书文化的研究。云南省图书馆的金志良对云南近代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昆明20家私家藏书进行了研究，撰写了《略谈昆明近代私人藏书的特点》一文，发表于《云南图书馆》1985年第3期，认为近代昆明私人藏书有六大特点，即外求内访，千里搬运；注重精槧本的收藏；把零散的资料作为藏书的一部分；精校细勘，编辑书籍，刊刻发行；变私藏为公藏，促进图书公开流通；从贩书中发现好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王晓珠在《思想战线》1996年第3期发表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图书事业》一文，认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图书来源是：第一，雕印书籍；第二，抄写图书；第三，编书与掠书；第四，赐书与求书；第五，购买图书。并指出南诏、大理国时期图书事业有四方面的特点，即同祖国内地的图书事业相比，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图书事业是滞后的；书籍生产方式仍以手抄为主；用民族文字抄写和编写书籍；图书内容多以佛教典籍为主。作者还认为，南诏、大理国虽然也设有藏书室如五华楼，但所藏的多是佛教书籍和一些来往公文，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机构，收藏图书的数量都不是很大。云南省图书馆的李孝友在1998年4月出版了《云南书林史话》一书。此书是作者“深感云南图书发展的历史、雕版印刷的源流及重点文献的价值，历来均未有人探索研究，实属空白，因此不揣固陋，著成此书，目的是想通过理顺云南图书发展的线索突出其所具特色，见其价值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从而引起人们的重视”^②。书内收录了《藏书话源》《云南的私人藏书楼》，分别介绍了战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的藏书史，介绍了云南历史上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并认为云南的藏书楼在三个方面显得别具一格：一是多方访求，二

① 徐雁：《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藏书研讨成果综述》，载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第419页。

② 李孝友：《云南书林史话·后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326页。

是既注重藏也不忽视用，三是编制书目题解。自2007年起，大理学院图书馆的何俊伟陆续发表了研究云南藏书史重点是大理藏书史和藏书文化的相关论文，对包括大理古代书院藏书、大理古代汉文大藏经的度藏、云南古代的私人藏书和道教藏书、白族地域古代官府藏书和道教藏书进行了研究，并从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学术因素，考察了南诏大理国藏书文化的发展。^①云南大学的甘友庆于2011年10月出版了专著《云南地方文献事业史》。本书将云南地方文献事业分为文献的生产、收藏、搜集、整理、传播交流等不同部分，并据此对全书的结构进行布局，力图能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云南地方文献事业。^②本书第四章“云南地方文献事业”主要对云南历代文献收藏机构、藏书来源等进行了介绍。作者认为：“由于与内地文献交流的日益增强及文献生产能力的不断发展，云南的藏书规模渐为扩大，藏书业历经千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官府藏书、寺庙藏书、私人藏书、学校藏书及图书馆藏书等系统。受文献生产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清代以前云南的藏书业应该说并不发达，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我国较早建立图书馆的省份，云南的图书馆事业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取得的成就却是首屈一指的，无论是图书馆建设数量、藏书规模、经费支持力度，还是图书馆管理水平、文献的流通和利用能力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③该书的其他内容，如云南文献生产方式的演进、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生产、云南地方文献搜访事业、云南地方文献整理事业、云南文献交流事业等，也为云南藏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大理

① 何俊伟：《简述大理古代汉文大藏经度藏》，《沧桑》2007年第6期。何俊伟：《大理古代书院藏书的历史与特色》，《大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何俊伟、汪德彪：《南诏大理国的藏书文化》，《大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何俊伟：《白族地域古代官府藏书的历史与特色》，《兰台世界》2010年第9期。何俊伟、汪德彪：《云南古代私人藏书浅谈》，《兰台世界》2011年第33期。何俊伟、汪德彪：《白族地域道教藏书的历史与特色》，《大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何俊伟、汪德彪：《云南古代道教藏书的历史特点》，《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2年第20期。

② 甘友庆：《云南地方文献事业史·前言》，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2页。

③ 同上书，第5页。

州图书馆的杨锐明和云南省图书馆的杨萌也开展了对大理古代书院藏书及私人藏书的研究。^①

因此，自20世纪以来，对藏书以及与藏书有关的购置、鉴别、校勘、装治、典藏、钞补、传录、刊布、题跋、用印、保护等藏书文化，国内学术界已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出版、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涵，也推动了藏书文化的研究。云南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开展了对地方藏书史，包括历史上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道教藏书等的研究，其中大理地区的藏书史及藏书文化研究成果尤为丰硕，为云南藏书文化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和资料基础。

基于现有资料，本书主要对1949年以前的云南藏书文化开展研究。

第二节 开展云南藏书文化研究的意义

对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而言，已取得的藏书史和藏书文化研究成果是远远不够的。云南历史上有过丰富的宗教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活动，近代也有过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辉煌。加强对云南藏书文化的研究，对于丰富云南民族文化史的内涵，推动云南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开展云南藏书文化的研究，还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是有助于理清云南古籍的藏书源流，认真总结历史上古籍保护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做好当前的古籍保护工作。

云南现存1912年以前的古籍藏书量十分丰富，1912年至1949年的文献藏量也十分丰富。截至2014年，云南省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就有216种，其中仅云南省图书馆就有126种。这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珍贵古籍，是通过历史上的宗教藏书活动、私人藏书

^① 杨锐明、杨萌：《榆城书语》，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第39页。

活动、书院藏书活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如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13种大理国写经，分别收藏于云南省图书馆和云南省博物馆，是1956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大理州凤仪县北汤天董氏“金銮宝刹”大殿中发现的。^①而这批经卷是明代洪武初年（1368）当地僧人董贤“费了一番苦心和劳动才汇集在一起的”^②。没有600多年前这位僧人的“发愿征访收集保藏”^③，这批珍贵的经卷恐怕早就灰飞烟灭，我们也看不到这批写经的真迹了。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列入国家第二批珍贵名录的《北齐书》，系宋刻宋元明递修本，书内钤有“二十万卷楼”“滇南建水修竹山馆主人梁之相藏书”等藏书印，可见此书原系建水藏书家梁之相插架之物。成立于1909年的云南省图书馆，其藏书是“就前清学务公所所存图籍暨两级师范学堂所存原日经正、五华、育材三书院书籍，移置其中以为基础”^④。大理市图书馆、剑川图书馆、鹤庆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善本就是当时的西云书院、金华书院、玉屏书院等藏书的基础上保存下来的。^⑤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中国的藏书楼和与藏书楼共生存的历代藏书家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功德无量的贡献，既传播了丰富的文献典籍，也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⑥

为了保护好明代云南姚安妙峰山的嘉兴方册藏，当时妙峰山僧人周理专门制订了《藏经愿约》，提出经卷“如被人私窃、拆散，函轴污损，颠倒，即与破坏佛身无异”^⑦。明代私人藏书家傅为訢，也制订有一套保护藏书的办法。^⑧清代剑川金华书院编制了《剑川金

① 周泳先：《凤仪县北汤天南诏大理国以来古本经卷整理记》，载李家瑞、周泳先、杨毓才、李一夫编著《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第7页。

② 同上书，第8~9页。

③ 同上书，第10页。

④ 《修订云南图书博物馆章程》，民国初年（1912）排印本。

⑤ 杨锐明、杨萌：《榆城书语》，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第39页。

⑥ 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第1页。

⑦ （民国）《姚安县志》卷五十五《礼俗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852页。

⑧ 王水乔：《云南藏书史略》，《云南学术探索》1998年第3期。

华书院藏书目录》，内有《商定收藏阅抄章程五条》，规定藏书楼交付在院肄业之学长二人，优给膏火，轮替经营，以时督视看伺、料检、曝晒、稽核、借还，凡在院肄业诸生借阅借抄，先禀山长，然后检付在院阅抄，不得携出书院。^①

所以，无论是寺院藏书，还是书院藏书、私人藏书，不仅保存了文献，也是后来各公共图书馆收藏古籍的主要来源。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古籍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沧桑保存至今，如何总结借鉴历史上各类藏书机构和私人藏书家图书保护的经验和经验，让其永久保存下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二是有助于我们认真总结历史上这些藏书家对地方文献收集、整理的经验，继承藏书家们热衷地方文献搜访和整理的优良传统。

袁嘉穀、赵藩、陈荣昌、方树梅、华世尧、梁之相、秦光玉、李根源等这一批近代藏书家，以搜访、收藏云南地方文献为己任，一生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刊刻。藏书家方树梅“不力农田力砚田”^②，曾北游万里访书。他们搜访、整理的文献，成为现代图书馆地方古籍文献的主要来源。

三是有助于我们认真总结、继承历史上藏书家爱书、读书的传统，进一步推动当前的全民阅读活动。

历史上有许多藏书家嗜书如命，把自己称为“书癖”“书痴”“书淫”。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就把自己叫作“书魔”^③，凡遇善本异书，必穷追不舍，哪怕借债典当，也要到手。^④云南历史上有一些有识之士和藏书家，也不乏其例。赖英，江西人，明正统间任临安府知府，有惠政，建藏书阁，广购经史诸书，以便诸生诵读。^⑤据道光《云南通志》记载，“沐璘，初，荫父禧千良进袭祖指挥僉事，以功擢云南都指挥僉事。景泰间进右军都督同知充总兵官。……好

① 王水乔：《云南藏书史略》，《云南学术探索》1998年第3期。

② 方树梅：《学山楼诗集》卷十，民国排印本。

③ 周少川：《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09页。

④ 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03页。

⑤（天启）《滇志》卷之十一《官师志》第七之二，抄本。

读书，长吟咏，尤工篆籀草书。建五华书屋，罗书史其中。”^①朱家民，字同人，南宁人，万历丙午（1606）举人，会试副榜，授涪州知州，擢潮州知府，迁贵州监军道副使。归里，节俭好义，笃于乡党，更置府仓会馆于省城，修万卷楼积书。^②赵魁，字聚轩，剑川人，乾隆庚辰（1760）举人，官宁洱教谕，以孝弟教诸生。土著人不知读书，为广购书籍，昕夕讲解，厥后从游云集，明伦堂尽成书舍。^③杨魁榜，字抡元，号淡斋，清代永北人。岁贡生，善属文确，约同志捐购经、史、子、集，结晴川学社，从游日众，成材甚多。^④杨魁榜写有《捐置书籍存留晴川学舍记》一文，其文不但提出了书籍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文中所阐述的“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何若积书以遗一郡，使郡之人士皆得而读之”的观点，突破了中国古代藏书藏而不用或重藏轻用的传统。其文略云：

“滇南远在荒服，为天下极边。永北僻处江外，又为滇省极边。诸生肄习，自四书五经而外，竟有终身不及旁览一书者。闻见如此，又安望其淹贯古今，以羽翼圣贤也哉？雍正甲寅秋，郡司马江公署太守篆，深有慨于斯，爰建立晴川学舍，广置书籍，捐资印刷御制及各宪颁发书文若干部，又于坊间购买若干部。其于圣贤典籍，古今文章，萃积居多矣。榜等窃念书卷无穷，一人积之，尤乐人人共积之。因而谋及同志高君暉、汤君良臣、刘君美、王君祚位、胡君国琳、杨君文奇、关君良汉、邹君天柱、马君麟之、刘君瑞十一人，各绵力，置书十余部，存学舍。凡远近生童，有愿诵习者，任其目披手录，且并请于署府江公，置立印簿三本。一存府，一存儒学，一存学舍。每岁以肄业生一人，专出入稽查任。庶置之一日，

①（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百二十六《秩官志》四之一《名宦》上，光绪二十年（1894）重刻本。

②（雍正）《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人物志》一之二，乾隆元年（1736）刻本。

③（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一百六《人物志》，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

④（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三十四《文苑传》三，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可存之百年。古人云：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何若积书以遗一郡，使郡之人士皆得而读之。其所积更无穷哉。至若踵事增华，备所未备，尤深有望于后之同志者深思，力学之士，其无负司马公之遗爱与同乡诸君之义举也夫。”^①清代昆明人李坤写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的《昆明经正书院藏书记》一文，认为藏书比用于救荒的仓谷更重要。其文略曰：“贵阳陈公，守云南，设丰备仓，藏谷几数万石。光绪壬辰后，赠屡不登。甲午，大饥，赖仓谷，人鲜殍者。乡父老德之甚，辄碑之口。余曰：‘君固喜食吾人，然更有饫于仓之谷者，藏书是也。’”^②近代云南藏书家梁之相，嗜书若命，见到好书，必不放过，哪怕是典当了物品也要换到^③，而且对他认为好的书，都要在扉页上附上一页撰写题识，对该书来源、版本、各种书目的著录及学术价值，一一记述考评。^④赵藩，“聚书十数万卷，多手自批识。”^⑤袁嘉穀，“喜藏书，插架牙签，庋藏甚富。”^⑥方树梅尽瘁乡邦文献垂四十年。^⑦因此，“从文化视角来研究私家藏书，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可以为古代私家藏书研究增添新的内容，把这项研究不断推向深入，而且可以切实地总结中华民族爱书、读书、治学的精神，继承和弘扬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⑧

① 袁文揆、张登瀛辑：《滇南文略》卷三十一，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

② 《思亭文钞》卷一，载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第67页。

③ 金志良：《昆明近代私人藏书的特点》，《云南图书馆》1985年第2期。

④ 王水乔：《云南藏书史略》，《云南学术探索》1998年第3期。

⑤ 方树梅辑纂：《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第419页。

⑥ 同上书，第447页。

⑦ 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附录三，稿本。

⑧ 周少川：《藏书与文化——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刍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第二章 宗教藏书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整体由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个系统组成。

所谓寺观藏书，就包括了寺院藏书和道观藏书。而寺院藏书又主要是指佛教寺院藏书。云南历史上这两类藏书，比较丰富。但就云南而言，由于宗教的多元性，仅寺观藏书这一概念已无法涵盖云南宗教藏书文化的全貌。

云南省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一个省，历史上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复杂，又有着漫长的国境线，因此是宗教种类最多的一个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原始信仰六类。云南不但有着丰富的原始宗教，而且与境外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宗教派别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是十分独特的。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云南，派系齐全，宗支繁多，共有梵文经典系佛教（阿吒力教）、汉文经典系佛教（汉传佛教）、巴利文经典系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藏文经典系佛教（藏传佛教）四大派系，这四大派系还有各自的若干宗支。不同的佛教派系吸收和整合不同民族的原始宗教和巫术文化，使佛教这一世界宗教在云南具有民族化特征。^①信仰汉传佛教的有汉、白、彝、纳西、蒙古、拉祜族中的部分人，

^① 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1～2页。

信仰藏传佛教的有藏、普米、纳西等族的大部分人，信仰南传佛教的有傣、布朗、德昂、阿昌等族的大多数和佤族中的部分人，信仰道教的有汉、彝、纳西、瑶、苗等族中的部分人。近代以来，在傈僳、景颇、拉祜、汉、佤、怒、苗、彝、壮、白等族中有部分人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①

因此，与此相适应，一些不同的宗教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宗教藏书文化。正如谢灼华所认为的，“中国古代藏书中有一种重要类型，即宗教藏书，它大致包括佛教的寺院藏书和道教的宫观藏书。”^②

第一节 佛教藏书

一 汉传佛教藏书

云南汉传佛教自成体系，有正宗，有支派，有与内地相同的禅宗，也有与内地相异的阿吒力，还有清斋派、月斋派以及名目繁多的应佛僧、苦修僧等等。^③据文献资料记载，“汉传佛教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传入云南。当时云南的晟罗皮已立为王，于是派遣宰相张建成入唐朝贡，‘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④又据天启《滇志》记载，“道胜寺，在州治南百里，唐玄宗时，张建成入朝，赐以浮屠像并佛书。建成归，创寺藏之。”^⑤由于当时中原和成都汉传佛教的显宗兴盛，因此张建成携带回的佛经为显宗经典，回到云南所传播的，也应是汉传佛教的显宗。而张建成，也就是史载将汉地佛经和佛教传入云南的第一人。^⑥

①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六《宗教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1页。

② 谢灼华：《论古代藏书的文化特征》，《图书情报知识》1996年第3期。

③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六《宗教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页。

④ 李京：《云南志略》，抄本。

⑤ （天启）《滇志》卷之十七《方外志》第十《寺观》，抄本。

⑥ 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40页。